

#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关系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朱和和

马克思在晚年思考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提出了一个极具理论张力的设想——跨越“卡夫丁峡谷”:像俄国这样保留土地公有制残余的东方社会,或许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绕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种种苦难,直接吸纳其创造的积极成果,迈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这一命题打破了历史单线演进的认知框架,为理解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路径拓展了理论空间,也成为后世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回应的“世纪之问”。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这一命题的实践探索。苏联的尝试虽曾辉煌,但其高度集中的体制最终未能持续有效地解决发展生产力与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问题,暴露出内在的僵化与局限。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提供了另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解答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非在经典作家预设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外部条件下展开,而是在生产力极度落后、外部环境复杂的东方大国独立推进的。因此,中国的“跨越”实践必然伴随着对经典理论的重新阐释、对自身国情的深刻把握,以及对发展路径的大胆创新。

系统研究“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看,这一研究有助于厘清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深化对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辩证统一的认识。从现实层面看,它为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合法性、独特性和优越性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视角,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学理基石。本研究试图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是一个对“跨越”命题进行持续性、创造性回应的过程,其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不仅验证了“跨越”的可能性,更在多个维度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原发性贡献。

## 一、“卡夫丁峡谷”命题的内涵、前提条件与理论挑战

### (一)“卡夫丁峡谷”命题的经典内涵与前提条件

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其核心思想在于区分“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要跨越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带来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即其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与血腥的资本积累过程;而需要积极“占有”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主要包括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世界市场。由此可见,“跨越”的本质是制度形态的超越与文明成果的承接之间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为这一跨越设定了严格的内外条件:内部条件是俄国农村公社需保存土地公有制,并通过革命使其成为“社会新生的支点”;外部条件则是西欧发达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并提供支持,实现“双方互相补充”。恩格斯后来也强调,落后国家缩短发展进程,“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这表明,经典设想高度依赖一个先行且成功的外部社会主义环境。

### (二)20世纪实践提出的核心难题

历史的演进与马克思的预期出现了偏差。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在俄国、中国等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东方国家取得胜利,这使实践者面临一个经典理论未作详细解答的根本性难题:在缺乏发达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雄厚物质基础,且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围的孤立或半孤立状态下,一个前现代因素浓厚的国家,如何独立建设社会主义?具体而言,这类国家如何在未经充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快

速构建现代生产力体系——完成工业化与社会化大生产,同时又能有效规避资本主义固有的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生态破坏等弊病?

苏联模式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与国家强力动员,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重工业体系,实现了生产力层面的某种“跨越”。然而,这一模式逐渐暴露出排斥市场、压制微观主体活力、经济结构畸形、难以持续吸纳科技进步与管理创新等弊端,在民生改善和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方面存在显著不足。其遭遇的挫折表明:仅依靠政治权力与计划手段,难以长期、健康、全面地完成“吸收文明成果”与“规避制度弊端”的双重任务,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历史教训,构成了中国探索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背景。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跨越”难题的阶段性解答与实践创新

中国的“跨越”实践是一个连续的、分阶段的、迭代发展的历史过程,每一阶段都针对特定历史课题,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突破。

### (一)解决“跨越”的政治前提(1949—1978)

这一阶段的核心贡献是解决了“跨越”所必需的政权与社会制度前提。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随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跨越”,使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跃迁,为后续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符合马克思关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论断,为保护和发展本国的社会生产力创造了根本条件。

然而,初期探索也经历了曲折。由于对社会建设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不足,一度试图单纯依靠生产关系的升级和群众运动来推动生产力“大跃进”,忽视了经济规律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导致发展受阻。这从反面证明,制度的跨越并不等同于生产力的自动跨越,后者需要找到符合经济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时期的经验与教训,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凸显了重新认识国情、探索新发展道路的紧迫性。

### (二)构建“跨越”的经济社会机制(1978—2012)

这是中国成功实现经济腾飞、奠定现代化基础的关键阶段,其创新之处在于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辩证吸纳资本主义文明成就、以制度力量驾驭资本逻辑进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机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确立历史方位。这一理论是对国情的清醒认知和科学定位,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落后基础上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来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实际上为“跨越”设定了一个长期性的、务实的历史过程,破除了急于求成的空想,使得吸收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成果成为阶段性的中心任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提供核心引擎。这是原创性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造。它破除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的思想教条,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这一“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从其制度母体中剥离出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市场经济被用作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其实践体现为: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开放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吸引了全球资本、技术和管理,使中国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在几十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同时,社会主义的制度属

性,如公有制主体、宏观调控、共同富裕目标、精准扶贫等,试图对资本逻辑进行引导和规制,缓解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公平,体现了在利用资本的同时“驾驭资本”、努力规避资本主义苦难的制度自觉。这种“利用”与“规制”的辩证统一,构成了“辩证跨越”的生动实践。

### (三)开拓“跨越”的文明新形态(2012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取得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新挑战。这一阶段的实践,标志着发展重心从追求“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从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转向着力破解“好不好”的问题,旨在全面重塑发展内涵,实现对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整体超越。

系统性建构应对综合挑战。通过协同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跨越”的内涵已从单一经济维度拓展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形成了系统性发展架构。这一整体性布局并非各领域的简单叠加,而是强调各子系统间的有机联动与相互支撑,旨在从制度设计与实践路径层面,系统性规避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政治失灵、精神空虚、社会撕裂、生态危机等综合性弊病。这种系统性思维方法,既体现了对现代化复杂性的深刻把握,也彰显了整体性治理的逻辑自觉,使“跨越”实践具备更强的协同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同时为后发国家超越单一发展模式、实现整体性现代化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直面“峡谷”中的深层苦难。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不仅是生产力层面的重大成就,更是社会主义制度规避“贫困苦难”的最有力证明,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绿色发展,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一系列实践旨在从根本上规避资本主义工业化伴生的“生态灾难”,将发展模式从资源消耗型转向生态友好型,体现了对“卡夫丁峡谷”所象征的深层社会与自然苦难的正面回应与系统治理。通过将反贫困与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战略核心议程,中国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既超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苦难、又避免其现代性后遗症的文明转型之路,使“跨越”实践在解决发展问题的同时,不断夯实发展的道义基础与可持续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确立新范式,既是前一阶段实践探索的理论升华,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征,从多维度正面回应“卡夫丁峡谷”所象征的各类苦难:以共同富裕破解两极分化困局,以“两个文明”协调抵御精神异化风险,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避生态危机,以和平发展道路摒弃对外掠夺战争。它清晰勾勒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深陷周期性危机、依赖对外扩张的传统模式,致力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这表明中国的“跨越”实践,目标已从单纯避免资本主义苦难,深化为探索并构建一种更具优越性、更契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新型现代化文明模式。

## 三、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原发性贡献

中国的“跨越”实践不仅回答了历史课题,更在回应中孕育了重大理论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

### (一)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马克思阐述了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序列,但并未详细论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

义后的具体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创造性地提出,在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历一个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任务的特定历史阶段。这一理论既明确肯定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客观承认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现实,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与“完成发达国家已实现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任务”统一于同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它为理解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与阶段性提供了科学理论框架,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

### (二)革命性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这一理论突破了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认知,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合理性,阐明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可以并存、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能够互补的逻辑关系。它从根本上回答了落后国家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进程中,如何构建既具备高效资源配置能力以吸收现代文明成果、又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规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经济体制这一核心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发展。

### (三)立足实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但未具体描绘未来社会的现代化图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立足于中国实践,提出了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道路。它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价值体系,这不仅是一种发展战略,更是一种文明主张。它表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会主义国家在吸收现代文明要素的同时,能够塑造出更合理、更人性化的现代性形态。这一理论贡献,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参照。

## 四、结论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实践中经历了深刻的检验、诠释与创造性发展。中国的探索表明,“跨越”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辩证的历史过程:它始于政治革命的制度性跨越,成于改革开放的辩证性吸纳——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并努力制约其负面效应,迈向新时代的整体性超越——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面的文明进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成功利用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成果,大幅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在制度层面始终保持规避资本主义核心弊病的自觉。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实践并未局限于经典命题的框架,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实质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回答了经典作家未曾详细解答的落后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世纪难题。

当然,中国的“跨越”仍在进行之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共同富裕、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挑战依然存在,这些正是“跨越”征程下半程需要继续解答的课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推动理论创新,是中国最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并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保障。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以其巨大成功和独特智慧,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还为世界发展道路提供了深刻启示。